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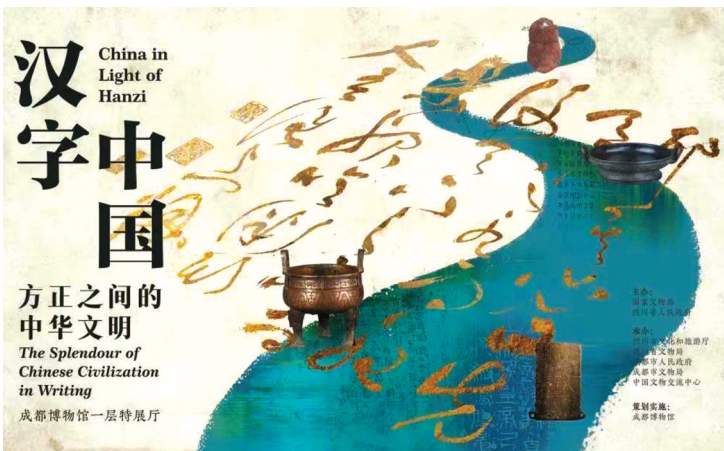
国宝“白马作”毛笔： 印证汉代文职官吏“簪笔”习俗

汉字书法艺术，是东方文化园囿中的一丛奇葩，它把线条所能显示出来的动态美感和意念境界挥洒到极致。汉字书法的无穷魅力，首先来自汉字独特的形体结构，决定性因素还在于书写者的文化修养、精神气质和表现技巧。而毛笔的发明，是我们祖先对文化事业的一大贡献，没有毛笔便没有汉字书法艺术，二者相辅相成，彼此倾注了无限生命力。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汉字书写方式孕育了篆、隶、楷、行、草等书体，每种书体各有其风骨妍态，这就扩大了书法的表现幅度，为毛笔的纸上驰骋开辟了更广阔的天地。

成都博物馆“汉字中国——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特展上，有一件“国宝级”文物，展示了中华文明的赓续发展。这件从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白马作”毛笔，是制作最精良、保存最完整，闻名于海内外的一支毛笔，人们公认它是我国毛笔的代表性作品。此笔通长23.5厘米，正是汉制长度单位的一尺，与王充《论衡》所言“一尺之笔”的长度相合。为何这支毛笔的笔杆后端尖头削尖？甘肃省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刘光煜对此进行了了解。



“汉字中国——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展览现场



“汉字中国——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海报

制作精良 与现代毛笔相差不多

“白马作”毛笔杆长21.9厘米，竹制，精细匀正，中空，浅褐色。笔杆中下部阴刻隶书“白马作”三字，刀法工秀整齐。汉代仍保留着“物勒工名”的手工业传统，“白马”当为制作此笔的工匠名字。刘光煜介绍，“目前没有其他文物刻有‘白马’，现存古籍文献中也没有关于‘白马’的记载，因为中国史书记载王侯将相比较多，记载工匠的比较少。我们在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其他毛笔，上面也刻着一些工匠的名字，但是刻有‘白马’的只有这一件。”

作为汉代毛笔的代表作，这支毛笔和我们现在使用的毛笔有何不同呢？刘光煜认为，“白马作”毛笔已经与现在的毛笔相差不多，这支毛笔的笔头外覆黄褐色软毛，笔芯及锋用紫黑色硬毛，刚柔并济，富有弹性，已经具备了古人对一支好笔所要求的“尖、齐、圆、健”四个条件，即所谓“笔之四德”，很适宜于在竹、木质地的简牍上书写。“这支笔的杆长是21.9厘米，笔头长1.6厘米，通长是23.5厘米，这正是汉制长度单位的一尺，刚好与《论衡》所谓‘一尺之笔’相吻合。”刘光煜

认为，这说明当时的毛笔制作已经有成熟严格的规范。

过去，有人认为，毛笔是秦代名将蒙恬创制的，如今已证实这个说法不成立。因为大量事实表明，远在蒙恬以前很久，毛笔即被广泛使用。刘光煜说，“新石器时代的先民绘制彩陶，使用什么工具，现在尚无定论，但是从彩陶的纹样和彩绘笔画特征推测，当时的人们已经在使用毛笔。比如说，画流线型的线条需要用尖峰细笔，画宽带纹就要用宽扁的笔。在一些彩陶上，用凝练的长线条画花纹，需要用含水量大的长峰硬毫笔画成。”他认为，黄河流域的先民较早地制作出性能优良的毛笔，并出色地掌握了运用毛笔的技巧，这对以后中国以尖峰毛笔为主的书写和绘画有决定性意义。

刘光煜介绍，商代盛行用龟甲和兽骨进行占卜，其占卜记录通常刻在甲骨上，刻前需要先朱或黑在甲骨上书写，然后依笔迹用刀。从残留的尚未契刻的文字笔画观察，可知当时已使用毛笔无疑。刘光煜说，目前所见最早的毛笔是在战国时期，笔杆用竹制作，笔头用的是兔箭毛，制作方法是把竹竿端部劈开，将理顺的毛束夹在其中，然后用线缠绕，再涂以漆。

后端削细 便于插入发中或冠上

谈到“白马作”毛笔，刘光煜认为，这支笔尤为特别的地方在于笔杆后端尖头削细，“汉代官员常将未蘸过墨，或用后洗净的毛笔尾端，横插入发中或冠上，以便随时取用，俗称‘簪笔’。簪笔的习俗流传已久，以后逐渐形成一种用簪笔代士的规制。”

《正义》曰：“簪笔，谓以毛装簪头，长五寸，插在冠前，谓之笔，言插笔备礼也。”《正义》所言，已经不是实用之笔，而纯为一种装饰物了，“白马作”毛笔尾端削为钝尖，显然是为了便于簪插，并且出土时的位置，正在墓主人头部之左侧，表明入殓时笔即簪头上。这可作为汉代文职官吏“簪笔”之制的印证。

竹制文物很难保存，这支竹制毛笔如何得以保存2000多年直至出土？刘光煜回答：“这和甘肃的地理条件、气候条件有关。磨嘴子汉墓气候干燥，又有沙质的土，非常适合木制文物的保存。我们从里面发掘了很多珍贵文物，包括几件国宝级文物。甘肃省博物馆也是汉代木质文物保存最多的博物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海韵

考古证明辽祖陵承继唐代陵寝制度

日前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举行的首届辽上京文化论坛上，辽上京考古队队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董新林介绍，最新的考古发掘，不仅初步确认了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陵寝的位置，且证明辽祖陵主要承继了唐代陵寝制度。

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公元907年-1125年），主要有五处帝陵。辽祖陵是其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陵寝，位于巴林左旗林东镇辽上京遗址西南约20公里的“祖山”一个口袋形山谷中。

2003年和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辽祖陵遗址进行了全面考古调查、试掘。2007年至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辽祖陵考古队，对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目前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我们根据地面调查，找到了辽祖陵陵园内最大的一处人工建筑遗迹——一座人工修筑痕迹清楚的大土丘。”董新林说，这个“土丘”略呈弧面扇形，东西长约125米，上下高57米。“我们推测这很可能



在辽祖陵玄官封土丘南侧发现的石人像、石犬。新华社发

是辽太祖陵寝玄官外的封土，而玄官主体应在人工土丘后面的山体内部。”他

说，在土丘西南侧发现2个残缺石人像和1个石犬，从而初步从考古学上确认

了辽太祖陵寝玄官的位置。

对于《辽史·地理志》所记载的“太祖陵凿山为殿”等史料，董新林说：“我们在考古调查和发掘中都得到了确认。”同时，考古队基本明晰了陵园内的主要建筑布局情况。更为重要的是，初步认识到辽祖陵营建规划理念。耶律阿保机驾崩后，葬在西距上京城约20公里的山谷中，这与唐朝帝王陵择地近都、位于都城西侧的规制相合。辽祖陵陵园分为内、外两区，形如“日”字，应是模仿上京城而设计，是古代中原王朝“帝陵若都邑”规划理念的体现。

唐朝帝陵有两种形制，即“依山为陵”和“堆土为陵”。董新林认为，辽祖陵既“依山”又“堆土”，主要承继了唐代陵寝制度的规制，又有创新，为后来辽朝诸帝陵所遵循，这反映出契丹族统治者对汉族文化传统的尊崇和效仿，体现出北方游牧民族在丰富中华文化内涵方面所作出的独特贡献，“可以说，以辽祖陵为代表的辽代陵寝制度可纳入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演变模式中，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新华社